

方志學概論



八丘吳王不
山者吳王不

閭廬子女家在閭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

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

可堪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

哭市殺生以迭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坐門外縻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槌城王

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

里死以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坐門外冢者閭廬冰室也

坐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子為王去

近門外機溪積中連
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

治也去縣八十里是

王之後不可繼述其

鴻城者故越王城也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

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閭

望太湖中闕百姓去

蘇門

大元

高等院校教學用書

方志學概論

來新夏 主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福州

方 志 学 概 论

来 新 夏 主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25印张 220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00

书号: 7173·586 定价: 1.20元

前 言

我国的地方志编写工作起源甚早，而且自秦汉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到了清代便发展成为方志编写工作的鼎盛时期，并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方志学。清代编写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占我国地方志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强，而且质量也多超越前代，许多著名学者亲身参与其事。在方志的研究工作方面，自顾炎武到章学诚经历了大量研究工作和理论建设的过程。顾炎武不仅运用丰富的地方志资料撰著《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而且还在《营平二州史事序》及其他论著中提出修志要旨和若干有关论点，初步奠定了方志学理论的基础。经过更多学者的努力，而由章学诚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封建社会编纂方志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方志编纂理论。这套理论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应有水平，其中某些方面至今尚有可资借鉴之处。至于对方志学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论述，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如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这些著述在当时成为编写地方志与研究方志学的重要读物。建国以来，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有进行综合研究的，有讨论志书体裁的，也有进行地区志书研究的，但始终没有一本通论性的方志学著述问世。从事地方志编写工作和有志于方志学研究的同志希望有一本提供比较系统的方志学知识的入门读物。这就使《方志学概论》的编写成为客观的需要。

一九八〇年秋，在天津召开地方史志协会筹备会时，就有人提出过编写一部《方志学概论》的建议。次年八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与会的高校同志经过酝酿，向大会建议编写一部《方志学概论》，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和培训全国各地史志编写人员使用。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同志们的赞同，即由协会委托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宁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辽宁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杭州师范学院等八院校参加编写，并推定由我担任主编。接着，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八院校同志总结了历代修志的传统经验，回顾了建国以来的研究成果，展望了发展远景，深感编写《方志学概论》的重要，决心编写一部适合方志学专业学习和全国地方史志编写人员需要的教材。会议围绕由各校提交的编写大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某些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如方志的起源与性质问题、史志关系问题等等都各抒己见，深入讨论。会议确定了《方志学概论》的编写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地继承我国方志学的传统，总结近年来编写方志的经验，系统地阐述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大家认为：编写这本教材目前虽然缺乏较完备的依据，但也要力求做到能系统而通俗地讲清有关概念，详细地叙述方志的起源与发展、商讨性地提出编纂新方志的要求与具体方法，使此教材能体现出应有的知识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在各校提交的大纲的基础上，拟定出统一的编写大纲，又进行了充分协商，分配了编写任务，并对写作体例和初稿试讲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安排。

分担编写任务的同志们，在本职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经过近半

年的努力,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中旬完成了草稿的油印稿,并于五月间在苏州举办的第一期地方志研究班上进行了试讲,得到参加研究班的全体同志的热情帮助。承担本书出版任务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加了试讲活动,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全体编写人员据此分别对自己所写的草稿进行一次修改,完成了初稿。这份初稿经过我和吴奈夫同志修订后,印成了第二次油印稿,先后于七月间在太原、十月间在天津蓟县的第三、四期研究班上试用,第四期研究班的学员还深入细致地阅读和讨论过,提供了若干有益的意见,使我们的修改工作具备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我还将第二次油印稿寄送给梁寒冰、傅振伦、左开一、刘光禄等专家和地方史志工作者审订,承他们在百忙中给予不同形式的指导和支持,推动了修订工作。

参加《方志学概论》草稿创编和修订工作的有周春元、傅贵九、陆振岳、林衍经、邸富生、吴奈夫、陈树田、陈明猷、林正秋等同志,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繁忙情况下,承担了任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第二次油印稿印出后,他们又委托我全权处理定稿工作。我对方志虽略有涉及,但学殖浅薄,钻研不深,见闻不广,膺此重托,只得勉力从事。然而整理编订工作量较大,非短时所能完成,而旷日持久,又不足应社会急需。于是复邀吴格和赵永东两位青年同志相助,进行了极其有效的合作。在我们共同商订宗旨、综理众说、斟酌去取的基础上,吴格和赵永东两位同志完成了调整篇章、编次文字的工作,为我提供了通读与定稿的便利条件。最后由我删定。

《方志学概论》的问世,主要是创稿人、有关专家学者和各期研究班学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书成众手,时间匆促,一些内容重复、论点歧异、文风不一等缺点还未能完全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应该由承担通读和总修任务的主编来负责。

我虽然主观上作了一些努力，但终因水平所限，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我真诚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

《方志学概论》在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广大地方史志工作者的关心、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吴格和赵永东二同志的助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以高年为本书题签。我都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来新夏

一九八三年二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方志与方志学	(1)
第一节 方志概说	(1)
一、方志及其起源	(1)
二、方志的名目	(6)
三、方志的种类	(12)
四、方志的性质	(18)
五、方志的特征和作用	(22)
六、历代方志的现存状况	(33)
第二节 方志学概说	(38)
一、方志学研究对象、内容及其意义	(38)
二、方志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40)
第二章 历代的方志编纂与研究	(44)
第一节 历代的方志编纂	(44)
一、汉魏隋唐时期的方志	(45)
二、两宋时期的方志	(59)
三、元明时期的方志	(68)
四、清代的方志	(79)
五、民国时期的方志	(88)
六、旧方志的局限性	(94)
第二节 历代的方志学研究	(97)

一、清代以前对方志理论的研究·····	(98)
二、清代方志学的建立·····	(109)
三、民国时期的方志学研究·····	(126)
第三章 建国以来的方志整理、研究与编纂 ·····	(139)
第一节 对于旧志的整理与利用·····	(139)
第二节 方志学研究·····	(145)
第三节 新方志的编纂·····	(154)
第四章 方志编纂的原则与体例 ·····	(163)
第一节 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	(163)
第二节 方志编纂的原则·····	(168)
第三节 方志编纂的体例·····	(175)
第四节 方志编纂中的人物立传问题·····	(186)
第五章 方志编纂的方法与步骤 ·····	(192)
第一节 编志机构的建立·····	(192)
第二节 专业人员的培训·····	(198)
第三节 资料的搜集、鉴别与整理·····	(199)
第四节 分撰志稿与总纂定稿·····	(208)
第五节 方志编纂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215)

附录

一、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附新编省、市、 县志基本篇目）·····	(221)
二、省市县地方志编纂工作意见示例·····	(232)
（一）《湖南省志》编写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232)
（二）关于编纂《武汉志》的几点意见·····	(237)
（三）县志编修初探·····	(247)
三、方志学重要书目论文索引·····	(267)

第一章 方志与方志学

第一节 方志概说

一、方志及其起源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方志的内容极其广泛，举凡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关隘、名胜、资源、物产、气候、天文、灾异、人物、艺文、文化、教育、民族、风俗……等情况，都为其所包容。它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记载各时期思想文化、开发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为后世提供取之不竭的研究资料。中国地方志历史之悠久，范围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数量之浩瀚，举世无与伦比，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方志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自古即有重视历史记载的优良传统。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王室的统治，中央及各诸侯国都设立史官，负责记事记言，保存各自辖区内社会变化、历史沿革的线索。史官随时记录下来的事件与言论，一旦编纂成书，就成了一国的史书。传说中的晋《乘》、楚《檮杌》、郑《志》等，就是各国的史书。

在周王朝设立的诸多职官中，有些职官的职掌与后世方志的出现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周礼·春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所谓“四方之志”，汉代学者郑玄认为是有关各地情况的记载，有如鲁国的《春秋》、楚国的《梲杙》、晋国的《乘》那样的典籍。《周礼·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清孙诒让疏：“方志，即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此官则为王说之，告王使博观古事。二官为联事也。”外史是周朝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一，掌管王畿以外各诸侯国的典籍，并负责整理以提供给诵训官。诵训官则负责把外史提供的“四方之志”，为周天子作讲说，使其了解天下情况，更好地治理国家。这时所谓的方志（即“四方之志”的简称），是记载各诸侯国历史与现状的典籍。

这种最早的“国别史”，是方域之史，并不同于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国史”，不具有代表奴隶主中央政权或封建王朝统治的那种权威性。它的最大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地域性，撰述者也多是本“国”本地的人士。这种以地记事的特征，也是后代方志的基本特征。因此，这种“国别史”具有今天意义上的方志的萌芽性质。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这种“国别史”也就成了记述某一地区社会面貌和地理沿革的历史典籍。后人沿用了“方志”这一名称，但对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改造，在不断丰富其内容的同时，使它的形式也逐渐走向定型，最后成为综合性的地方百科全书。

过去的学者曾指出过这种“国别史”与后世方志的渊源关系。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就说：“方志之由来久矣。……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若晋《乘》、鲁《春秋》、楚《梲杙》之类，是一国之全

史也。”^①“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②梁启超更明确地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③。指出这种渊源关系，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不能偏执一方，而忽视其它因素的影响。

方志又导源于古代的地理书。“地理”一词，《周易·系辞》中曾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东汉王充解释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地理知识的萌芽，是随着生产斗争的发展而来的。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我国人民很早就开始了从不同方面观察和描述各地的自然与经济情况，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远在公元前七——前三世纪（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活动地区的扩大和学术思想的活跃，出现了一些总结前人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的专门著述，《山海经》和《禹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

《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地理书，内容包括《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其中《山经》成书最早，记载也最丰富。全书以山为纲。以方向与道里为经纬，附载动物、植物、矿物、民族、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神话等均有参考价值。

不少古方志叙述纂修缘起时，往往联系到《山海经》，如宋欧阳忞在所撰《舆地广记》序文中提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隋书·经籍志》也说：南齐陆澄所撰之《地理书》，“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来家以为此书”。凡此都可以说明，后世纂修方志者，每多取法《山海经》。从记载内容来看，《山海经》的记风土、人物、世系，与后世方志的设风俗、人物门类，是一脉相通的。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

②同上书《为张吉甫司马书大名县志序》。

③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禹贡》为《尚书》的一篇，较《山经》晚出，作为一种地理著作来看，它的价值在《山经》之上。此书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了我国古代的地理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都有描述。长江、淮河等流域也略有涉及。《禹贡》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区域志，历来言地理者，大抵溯源于《禹贡》。《隋书·经籍志》说：“晋世虞挚依《禹贡》、《周官》，作《畿辅经》。”元代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说：“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国有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都把《禹贡》列在首位。后世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区域志，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同《禹贡》都存在着源流关系。如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等。元朱思本撰《九域志》，条分缕析，也“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①。民国纂修的《佛山忠义乡志·赋税志》明言：“志例有赋税名目，《禹贡》一书为赋税之祖，《周官》则兼详力役。”上述这些例子，足以说明《禹贡》一书在方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方志的起源，还可追溯到古地图的形式。

我国舆图出现甚早，原始的地图可能远在文字发明以前就有了。至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使用已极为广泛。周王朝为此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官职，负责掌管各种舆图。据《周礼》所载，就有“听闾里以版图”的小宰，“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的大司徒，掌天下之地图、主四方之职贡的职方等。还有专门“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②的土训官。这说明地图在当时已经受到人们普遍地重视，已经具有象征国家主权和土地、人口的意义了。

^①朱思本：《九域志自序》。

^②《周礼·地官·土训》郑注。

一九七八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了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战国时代中山国的“兆域图”。它是在一块长九十五厘米、宽四十八厘米、厚一厘米的铜版上，用金丝镂嵌的线划、符号和数字，来表示地形和建筑工程的设计图版，上面还有四百五十字的铭文作说明。这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地图。它反映了当时我国地图的测绘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也证实了《周礼》所说当时专门设置官吏分管各类地图，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土地之图”的广泛运用，导致了“图经”的兴盛。图经，就是地图的说明文字。“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①章学诚也曾指出：“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昉也。”^②前面说到《山海经》一书，原来是有图的，“经”不过是“图”的说明或注脚。清人毕沅甚至说《山海经》中的《山经》是古代的“土地之图”^③。因为原始图象只画实际山水事物，至于各处的方位和距离不能在图上表示出来，到了有文字以后，便在图上用文字说明它们，如现在《山海经》中所述：西若干里曰某某之山，又东南若干里曰某某之山。这些记载很象是地图上的说明或注脚，后来图散失了，只剩下这些说明，便成了有文无图的《山海经》，但它的原始形态却是以图为主体的《山海图经》，或是有图无文的《山海图》。^④图与经的主属关系，在后代方志中虽然不复存在，但从后代方志附有地图的体例，仍可见方志与古地图的渊属关系。

①王明中：《山海经图与职贡图》。

②《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③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

④参阅王庸《中国的原始地图及其蜕变》。

宋朝的司马光就曾指出过周代职方等官的职掌、作用与后世方志的系属关系，他在《河南志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亦其遗法也。”宋《景定建康志序》即步其说，谓：“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方志源流做了这样的叙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这段话大体上概括了方志起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的方志形式，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备起来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流性，是我国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的和基本的特征。方志融合的源头既多，因而成型的过程也就极其缓慢。从春秋战国时期发端，中间经汉魏迄于隋唐，方志的内容与形式逐渐得到丰富并臻完善，至宋时才最后确立了方志的体制。

二、方志的名目

我国方志有着众多的名目，即使是在同样的名目下，也有着朝代、年号、地称上的种种差异。这些不同的名目，既表明了方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体例的不断完善，曾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又反映了方志在其成型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这些名目有：

(一)图经 又称图志、图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①，所以图经是地图与说明文字的合称。

图经这种形式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版图”、“土地之图”等形式，因为从前面所说的“兆域图”看来，这个时期的“版图”、“土地之图”很有可能是带有文字说明的。周以后，秦有《秦地图》，汉有“郡国輿地图”，都带有说明文字。到了东汉，便正式出现了“图经”的名称——在《华阳国志·巴志》篇中引有东汉《巴郡图经》的文字。这是现在所知最早以“图经”为名的著述。两晋南北朝时期，图经是方志通行的名目；唐宋则是图经发展的特盛时期，现存最早的两种图经——《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残卷，便是唐代的作品，并且这一时期的图经，基本都改由官修；南宋以后，图经逐渐走向下坡，到了明清，已寥寥无几，它的地位，已被“志”所取代了。

从地图到图经，这是方志形式有所发展的结果。图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述一定内容的，但许多内容，单靠图像往往很难表示，必须附加文字说明，尤其是涉及图像以外的事物，更非文字表达不可。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日趋多样与复杂，图像愈益不能满足记叙的要求。这样，原先的“载言”，即所附加的文字说明的分量，势必愈益增加，图的作用势必愈来愈小，越往后，便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末大于本，而輿图反若附录”的现象。

至于图志、图记，如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记》等，考其内容、体例，与图经并无二致。“经”即“载言”之谓，“志”、“记”也是文字记载的意思。因此，图志、图记，只是图经的变称而已。

^①李宗潜：《祥符州县图经序》。

(二) 传 主要记述地方的人物与风俗。此类书以东汉的《南阳风俗传》为滥觞，相继而作的很多，在汉时就有《海内先贤传》、《沛国耆旧传》、《陈留风俗传》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耆旧、先贤等作一地传名的，为数甚多。隋唐以后，这类书就不常见了。这种单记人物、风俗的传，可能是从“正史”纪传的“传”脱胎而来。伴随着方志体例的发展，它被新兴的体例所概括而逐渐地湮没。清以前的这类传书，没有一部流传至今，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散见于类书、政书、注文中的片段条文。但是到了清末民初，又有人撰著这种传，如顾沅的《吴郡名贤象传赞》、马通伯的《桐城耆旧传》、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先哲传》等。

(三) 记 记的名称似起于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而流行于魏晋隋唐，如魏张晏的《地理记》，晋王隐的《晋地道记》，梁吴均的《十二州记》，后魏徐之才的《宋国都城记》，隋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唐陆广微的《吴地记》，等等，数量是不少的。这一阶段的州郡地记，只有陆广微的《吴地记》，还大致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其余全部失传。^①自宋以后，“记”的名称便逐渐为“志”所代替。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出现的内容丰富、体例空前完备的《太平寰宇记》，给以后修志以极大的影响；后世志书基本沿用了它的体例，然而却并未因袭“记”的名称。

“记”和“志”，意义其实是一样的。郑玄就曾经说过：“志，谓记也。”^②清孙诒让跋《永嘉郡记》辑本也说：“或称《永嘉地记》，或称《永嘉记》，亦作志。斯并文偶省易，谊互通假。”可见记与志的名称虽异，却并不寓有特别的意思，它只表明了一定历史阶段对于某一方志名目的时尚不同而已。

^①清人关于这类书的辑佚本，数量较多，见于《汉唐地理书钞》、《麓山精舍丛书》、《二酉堂丛书》的就有六十二种。

^②《周礼·春官·小史》郑注。